

第3卷第1期, 2010年3月

(本期译自 Number 58, Winter 2010,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Vol. 3, No. 1, March, 2010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海外分校和跨国高等教育

为什么海外分校可能不可持续发展?	1
海外分校: 新趋势和新方向	3
波斯湾地区海外分校的全球招生	5
跨国高等教育: 产生原因及其受益者	8

国际问题

政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高等教育: 一项个案研究	10
高等教育国际招生的未来	13
权力和大学校长	15

私立高等教育

印度私立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方向	17
哥伦比亚的私立高等教育: 问题和成就	20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

中国的本科教学评估: 成绩与问题	23
中国的学术自由和公共知识分子	25
中国高校的多样化	27

俄罗斯的高等教育改革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 俄罗斯的案例	29
俄罗斯大学的“适中”合作战略	32

非洲高等教育的发展

埃塞俄比亚: 扩张的困境	34
南非提高学生保持率和成功率的措施	36

新书简介	39
------------	----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 主办

主编：刘念才
顾问：菲利普·G·阿特巴赫（美）
编辑：吴 燕

刊号：沪（K）第 0621 号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东川路 800 号上海交通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院
邮编：200240
电话：021-34205947*13
电邮：jihe@sjtu.edu.cn
<http://gse.sjtu.edu.cn/kxyj/xskw.htm>

Editor: Nian Cai Liu
Advisor: Philip G. Altbach (USA)
Assistant Editor: Yan Wu

Address: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800, Dongchuan Road
Shanghai, 200240
China
Tel: 86-21-34205947*13
Email: jihe@sjtu.edu.cn
<http://gse.sjtu.edu.cn/kxyj/xskw.htm>

《国际高等教育》简介

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的日益加剧和中国高等教育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与国外高等教育交流的需求与日俱增。《国际高等教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并将努力发挥中外高等教育交流的桥梁作用。

本刊由两部分组成：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http://www.bc.edu/bc_org/avp/soe/cihe/）编辑出版的“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的中文版，每年 4 期；由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围绕中国与国外高等教育热点问题编辑出版的专辑，每期一个主题，每年最多出 6 期。

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编辑的“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每期包含十余篇有关国际高等教育现状和发展趋势的文章以及新书简介。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编辑的专辑则包含世界一流大学、大学评价与排名、研究生教育、科学英才迁移等热点问题的国内外研究论文、研究报告、综述文章、书评以及有关的会议和活动信息。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Guoji Gaodeng Jiaoyu) is an online journal with an aim of playing the role of bridge between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communities. It consists of 4 issues each year translated from the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published by the Boston Colleg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http://www.bc.edu/bc_org/avp/soe/cihe/) in USA and up to 6 issues each year focusing on selected topics of both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interests, such as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university ranking, graduate education, and migration of academic talents.

Each issue translated from the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by Boston College contains more than a dozen of short articles covering major aspects and trends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and new publications. Each issue focusing on selected topics of higher education contains original studies, preliminary reports, review papers, letter to the editor, book reviews, and up-to-date information on activities and opportunities on the selected topics in China and around the world. The issues focusing on selected topics will b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nd published online at <http://gse.sjtu.edu.cn/en/>.

为什么海外分校可能不可持续发展？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终身教授、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

电子邮箱: altbach@bc.edu

海外分校 (branch campuses) 正如雨后春笋般地在世界各地出现。根据无边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 (Observatory on Borderless Higher Education) 的调查, 2006 年到 2009 年间, 海外分校的数量增长了 43%, 达到 162 所(见 Rosa Becker 发表在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上的文章)。对海外分校的界定众说纷纭, 我认为观察组织的定义足以满足需要:

“海外分校是指一所高校的离岸实体, 该实体以外国高校的名义由主办高校独立运营或与他方合作经营 (一些国家要求外国高校与本土高校合作)。在成功修完学业要求的基础上, 这些完全在该实体学习的学生可以获得主校的学位。”

在数目不断增加的海外分校中, 许多学校可能只有短暂的存活时间, 还有一小部分可能是有害的。坦白地说, 除少数例外, 大部分的海外分校并不是真正的大学, 而是只提供有限的跨境学习项目的小型专业机构, 以便在觉察到的市场中牟利。因此, 许多海外分校只开设办学成本低、全球需求广泛的企业管理和信息技术等最常见的专业也就不足为奇了。除了那些在提供基础设施的慷慨东道国 (如波斯湾阿拉伯国家、新加坡等) 内设立的分校, 其他的海外分校通常比较简陋, 像是办公楼, 而不是学术机构。

海外分校未来的教师危机

确保主校的教师来海外分校授课, 可能是海外分校可持续发展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实际上, 吸引主校的教师到分校长期教学是非常困难的。因此, 海外分校的课程通常采取集中授课的方式。没有来自主校的教师, 海外分校还是主校的一部分吗? 海外分校经常雇佣那些不属于主校或在主校缺乏经验的教师。如果主办方是美国高校, 其分校会努力寻找在所在地或其他地区的美国人任教, 或雇佣有留美经验的当地人。类似地, 管理人员和其他行政人员通常也不是来自主办高校。

分校吸引主校教师前来任教的能力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科研活跃的资深教师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 尤其是自然科学领域的教师。年轻教师则担心海外任教不会给自己带来升职的机会。此外还有对子女教育、配偶工作和其它家庭问题的顾虑。即便学校提供额外的报酬和其它津贴, 往往也很难吸引主校的教师到海外分校任教。这个问题正逐步恶化。愿意接受重新分配的主校教师数量非常有限, 很快就会出现无人可用的局面。

复制主校

海外分校通常提供的专业数量有限, 一般都是那些能够吸引大批学生、对基础设施要求较少、教学成本相对低廉的学科专业。在设施、课程宽度或学习经历方面, 海外分校很少能反映出主校的情况。随着政府、认

证机构、海外合作伙伴和学生对教育目标了解的深入，他们可能会要求分校提供“真材实料的教育”。英国利物浦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在苏州联合创办的分校就是个有趣的案例。该分校主要关注教学，但中方合作者要求其重视科研，因为利物浦大学在英国是一所研究型大学。但是对利物浦大学来说，很难在中国复制英国的一切。另一个案例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新加坡创办的医学分校，由于新加坡当局认为该分校未能兑现其承诺的培养目标，因此取消了这个分校。

复制学生

如果分校想要提供和主校一样的教育，那么分校学生的选拔和质量应该大体上与主校一致。对那些非常著名的高校（例如康奈尔大学、利物浦大学、莫纳什大学等）来说，这是很难做到的。然而对很多排名不甚靠前的高校来说，并非那么困难。目前，值得质疑的是绝大多数分校是否应该只招收那些符合主校要求的学生。在分校所在的东道国，随着对顶尖学生的竞争日益激烈，这些问题显得日渐严重。

在有的国家和地区，随着更多分校的建立以及当地高校水平的必然提高，生源规模有时变得不可预测。对波斯湾阿拉伯地区的国家，这一问题可能尤为严重。该地区已经建立了无数的分校，当地学生、甚至周边地区的学生，不久后可能都会有很多其他选择。一些由所在东道国政府或其他机构投资建立的分校已经面临招生困难，很多分校都招生不足。

东道国情况的不断变化

世界上很多地区的高等教育环境都正在不断变化。由于发展中国家对高等教育需求的扩大，因此在那些国内高等教育资源不足或高校质量被认为不高的国家，大批学生出国留学，非常需要海外分校。在不久的将来，由于越来越多的人要求进入大众或精英高校，可以预见到高等教育的扩张将会非常厉害。但是更长时间以后的情况则难以预测。许多国家（例如中国）正在扩大其各个层次高等教育的规模，因而海外分校可能很快会变得缺乏吸引力。原本不允许太多国外高校介入的印度，可能会很快打开其国门，其本土顶尖高校的招生规模相当有限。印度已经宣布了扩大顶尖高校招生规模的计划，包括将首次招收留学生的多所印度理工学院（Indian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总之，海外分校的未来市场难以预测。

风险与危险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海外分校知之甚少。建立海外分校的高校普遍未考虑长远的问题。建立一所真正能够提供与主校相同教育质量的海外分校并非易事，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困难。可持续发展应该是建立分校时考虑的一个主要内容，但是几乎没有几所海外分校体现这一理念。在已经建立海外分校的国家，分校在更长一段时间之后的前景尚不明朗。分校可能会“风靡一时”，但是意想不到的困难及其带来的对学术声誉的损害、经济损失、低劣的学生服务已经隐约在望。

海外分校：新趋势和新方向

Rosa Becker

无边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高级研究员

电子邮箱: r.becker@obhe.ac.uk

据无边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的最新报告显示, 2006年至今, 全球海外分校的数量增长了43%。与此同时, 海外分校的建立也呈现出一些新的方向。

定义

对于海外分校的定义, 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说法。除无边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2006年发布的有关海外分校的报告以外, 没有任何官方发布的全球或某一地区所有海外分校的名单。这为分析和比较不同国家新出现的趋势带来不少困难。

由于分校、卫星校园(satellite campuses)和学习中心三个概念之间的界限含糊, 所以在判断是否存在某一活动时, 需要人们的主观判断。传统分校的特点是拥有学术和学生设施(如图书馆、学生宿舍、娱乐场所等)、研究设备以及一系列的课程设置。但在本文中, 分校也指那些在独立的办公场所(即不在某个国外高校里)提供至少一种学位教育项目的小规模活动。

有一些机构不符合无边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对海外分校的界定。例如, 提供一所以以上高校课程为学校、通过合伙机构提供教育的学校、只提供联合学位或双学位的学校、只提供部分学位课程的国外高校以及为国内学生提供国外学习机会的学校。此外, 本文所讲的分校也不包括那些仿效国外高等教育运作模式, 但与某一具体高校没有关系的学

校, 如开罗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of Cairo), 以及外国机构参与型大学——遵循东道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并被其管辖, 但最初的学术支持来自国外高校, 如印度尼西亚的瑞士德国大学(Swiss-German University)。

市场趋势

2006年9月至今, 全球海外分校的数量增长了43%, 达到162所。越来越多的输出国和接受国参与海外分校的发展。其中, 美国高校建立的海外分校数及其在过去3年中的增长速度, 都继续处于主导和领先地位。美国高校已经建立78所海外分校, 占目前海外分校总数的48%。紧随美国之后的是澳大利亚(14所)、英国(13所)、法国(11所)和印度(11所)。

在接受国中, 阿联酋明显处于领先地位, 国内共建有40所海外分校, 占全球海外分校总数的1/4, 其中约2/3位于迪拜国际学术城(Dubai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ity)。阿联酋之所以处于领先地位, 主要原因在于学生对海外分校需求量大, 以及该国希望通过建立知识经济来减轻对石油出口的依赖。中国是第二大接受国, 国内建有15所海外分校。接下来则是新加坡(12所)和卡塔尔(9所), 两国政府都在积极努力地成为所在地区的“国际高等教育中心(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hubs)”。

最近, 海外分校的输出与输入方向开始

发生变化。就在三年前，“由北到南”建立海外分校的方式明显占据主导地位，即主要是发达国家的高校到发展中国家建立海外分校。但是现在，“由北到北”，特别是“由南到南”的发展呈上升趋势。“由南到南”是指发展中国家正在国外建立海外分校，虽然速度缓慢，但是数量在不断增加。“由南到南”建立海外分校的增加，主要归因于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以及它们雄心勃勃地想出口高等教育并从中谋利。另一个原因则在于那些社会经济背景和发展方向相似的国家也需要这样的教育项目。

总之，海外分校市场的竞争已经更加激烈了。一些海外分校的关闭，再次说明高校在决定建立海外分校之前，应该进行详细的市场调查。

对海外分校的资助

建立海外分校的提议已经不再仅仅是由主办高校提出了。越来越多的分校是受到接受国的政府或其他机构的邀请而建立的，并最终得到它们资助。中东和东南亚地区已经建立了若干个“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给外国高校建立分校提供优惠条件。那些为外国高校提供支持、经费资助或基础设施的国家，吸引到的海外分校数最多。例如，阿联酋吸引到的海外分校数量超过其它所有国家，部分原因在于它丰富的石油资源，这使其能够为建立海外分校的外国高校提供经费帮助和其它支持（如无税贸易区）。

以迪拜国际学术城为例，在那里建立海外分校的外国高校享有分校全部归自己所

有、税收全免和利润全部汇回的優惠。但是学术城对进驻的海外分校挑选非常严格。在卡塔尔，卡塔尔基金会（Qatar Foundation）承担了在其教育城中建立海外分校的所有费用，包括校舍建造费、基础设施费和行政助理费，甚至还包括员工奖金。在教育城中海外分校就读的卡塔尔学生，有资格得到当地政府的助学金。那些被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中美国海外分校招收的学生，有机会“交叉注册”（cross-register），即学生可以在美国海外分校 A 选修一门课程，在美国海外分校 B 选修另一门课程。在亚洲，韩国的仁川经济自由区（Incheon Free Economic Zone）将可能提供税收激励和财政支持，如提供校舍建造费用或降低房屋租金。这些条件都能够刺激外国高校前去建立分校。

结束语

海外分校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增长可能会带来对留学生的全球竞争，其中有一些成功的例子，也有很多失败的例子。针对近期出现的海外分校关闭事件，高校已经更加意识到建立海外分校的长期代价和风险，它们开始更多地寻找资助者、采用公私合作的方式来分担并减轻风险。

作者注：《海外分校：市场和策略》（International Branch Campuses: Markets and Strategies）的报告全文请参见 http://www.obhe.ac.uk/documents/view_details?id=770，仅限观察组织成员。

波斯湾地区海外分校的全球招生

Spencer Witte

牛津大学硕士毕业生

电子邮箱: Spencer.Witte@sant.oxon.org

作为波斯湾地区高等教育体系西方化趋势（实际上是美国化）的一个更显著标志，即将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成立的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New York University-Abu Dhabi，将于2010年秋季开始招生），自然引起了人们将之与卡塔尔多哈教育城（Doha's Education City）现在已经开设的6所授予美国学位的海外分校进行比较。乍看起来，阿布扎比政府所签署协议的条款与卡塔尔基金会所签协议的条款具有相似之处：两个协议都提供全面的经费资助；都承认大学具有完全的自主决策权；都在表面上保留了招生标准；学生完成必修课程后将得到与本校学生一样的学位。但是，两者为招到足够的学生而做的努力，表明两者在策略上非常不同。这些差异对于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融入阿布扎比的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卡塔尔基金会和卡塔尔学生

与波斯湾合作委员会（Gulf Cooperation Council）的其他国家一样，卡塔尔长期以来一直挣扎在一个具有根本性的困境中：如果熟练和不熟练的外籍劳工必然不断涌入的话，那么卡塔尔本土经济的多元化如何才能最优化发展？1975年，即卡塔尔宣告独立之后的第四年，其15.8万人口中有9.8万是移民劳工。来自南亚的劳工数量超过了阿拉伯劳工数量，其比例达到3:1。为此，政府制定了相关的教育政策，希望为日益增长的混合

和私立部门培养合格的国内劳动力人口，从而至少部分地改变卡塔尔劳动力人口的不平衡状况。

为实现这一目标，卡塔尔基金会就教育城中6所海外分校各自需要招收的卡塔尔学生数提出了明确的指标。目前，卡塔尔学生的人数占学生总数的46%，这个数字无论怎样看也不算大（2009年共有200名毕业生）。卡塔尔基金会希望招收的卡塔尔学生数量能够增加，并采取了多方面的对策，但主要侧重点在本国和本地区。自2001年起，教育城开始提供“学术桥项目（Academic Bridge Program）”，为那些希望进入教育城接受高等教育但却无法实现的学生提供长达两年的预科课程的教育。同样，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卡塔尔分校（Texas A&M-Qatar）也开展了“农校学生机会项目（Aggie Opportunity Program）”。该项目设置了临时性招生的标准，从而有效地增加了该校招收的卡塔尔籍学生的数量。2006/07学年，该项目招收的卡塔尔学生中，7/9的学生后来被校方很高兴地接收为全日制学生。此外，教育城还采取了拓展性的措施，面向潜在生源的措施不仅面向卡塔尔高中生，而且面向其他波斯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高中生。例如，卡塔尔的乔治敦大学对外服务学院（Georgetown University 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s）在2007年中5个月内访问了卡塔尔的高中30多次。

采取的不同策略

为了实现招收 2,000 名本科生的最终目标, 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已经采取了不同的方法。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的招生数量并没有达到阿联酋政府明确规定的数字。纽约大学的校长约翰·塞克顿 (John Sexton) 认为, 阿联酋国家的学生人数占学生总数的比例可能将会很小。因此, 学校没有开设预科项目。相反, 塞克顿和阿布扎比的分校已提高了其入学要求。学校的“全球教育”和空前的经济支持很有吸引力。那些原本可能进入美国常春藤高校或者纽约大学华盛顿校区的留学生, 将会愿意选择具有波斯湾风格的本科教育。据估计, 阿布扎比分校 40%~50% 的学生将是美国学生。为了有助于完成该目标, 学校鼓励来自全球最精英中学的辅导员每人提名两位可能入学的学生。除此之外, 该校还在南极洲以外的各个大洲开展招生活动。

潜在的挑战

简言之, 为实现在阿布扎比的招生目标, 诸如纽约大学之类的精英大学必须吸引留学生。虽然这一政策与大学希望增强自身国际影响力的目标一致, 但是违背了阿布扎比一直以来对外来人口所持的矛盾立场。与迪拜相比, 阿布扎比依赖涌入人数较少而文化相似的阿拉伯国家和巴基斯坦的工人。阿布扎比巨大的石油储量 (占阿联酋石油总量的 90% 以上), 使之能够对当地经济的多元化采取更加谨慎的方法。阿联酋的前任总统谢赫·扎耶德·本·苏丹·阿勒纳哈扬 (Sheikh Zayed bin Sultan Al-Nahyan) 就公开说过大量的外籍人口将继续“威胁我们社会的稳定和下一代的未来”。

事实上, 这些担心不仅体现在当今的阿

布扎比, 也体现在当地高等教育结构的发展上。阿布扎比政府宣布 2008 年为“民族认同年” (The Year of National Identity)。除两所精英大学 (另外一所是巴黎索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 的分校以外, 政府只允许本土强大的家族开办私立大学。比较显著的例子是艾赫森大学 (ALHOSN University) ——创建于 2005 年, 其大学口号是“全球化知识、本土愿景 (Global Knowledge with Local Vision)”, 以及阿布扎比大学——创建于 2003 年, 座右铭是“普遍的知识、永恒的真理”。这些大学的入学标准相对较低, 以便能够可以招收大量的当地学生。

与当地社会建立联系

如果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能够取得成功, 那么它无疑将会成为波斯湾地区首要的高等教育机构。然而, 就目前来讲, 它的招生策略可能会激发世界一流教育的可获得性 (受到阿联酋全面资助) 与当地居民相对不可获得性之间的紧张关系。

人们通常会质疑教育城与外面的卡塔尔社会之间的关系。教育城的官员和学术管理者对精英化和孤立的指责非常敏感, 尤其是当人们表现出对具有 90% 卡塔尔本土大学生的卡塔尔大学 (Qatar University) 已被遗忘的担忧时。卡塔尔基金会试图用海外分校、当地的经济圈和国立大学三者之间的关系来回应这些指责。他们认为, 教育城的最大益处在于能够随时提供专家, 以备卡塔尔大学之用。简言之, 教育城就是一个长期建在当地的顾问机构。

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展。2008 年, 该大学同阿布扎比教育委员会 (Abu Dhabi Education Council) 合作, 发起了谢赫·穆罕默德·本·扎耶德大学学者

项目 (Sheikh Mohamed bin Zayed University Scholars Program)。该计划将从其他阿联酋国立大学中选拔一大批最有能力的高年级学生，参加纽约大学提供的培养学术能力和领导力的项目。由于分校的招生计划以及遍布阿布扎比的人口不均衡所带来的文化不安，对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来说，建立并扩展学校与当地社会和现有大学之间的有形联系

将是至关重要的。

编者注: Spencer Witte 刚毕业牛津大学，其硕士论文的题目为《波斯湾地区的高等教育：卡塔尔和阿联酋的美国大学》(Higher Education in the Gulf: America's Universities in Qatar and the UAE)。

跨国高等教育：产生原因及其受益者

Vik Naidoo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创新、工业、科学和研究部 (Department of Innovation, Industry, Science and Research) 企业联系部门 (Enterprise Connect Division) 战略顾问、新西兰奥克兰大学 (University of Auckland) 国际关系前副主管
电子邮箱: viknaidoo@gmail.com

跨国高等教育日益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学生不在学位授予高校所在的国家，而是在接受国完成高等教育。虽然这在高等教育中并不是一个新事物，但当今跨国教育在全球扩张的规模却非常不同。由于缺乏全面的统计数据，在笔者最近的文章“跨国高等教育：现状盘点”【《国际教育研究》(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09年9月刊】之前，对跨国教育增长的理解大多基于轶事证据。通过分析二手资料，整合相关书籍、学术刊物、报纸和高校网站上的一系列信息，“跨国高等教育：现状盘点”一文对2008年年中时跨国高等教育的规模进行了量化统计，全球大约有3,800~4,300个跨国教育项目。

虽然跨国高等教育并不是一个新现象，但是其全球快速扩展是最近才出现的。这种增长发生在教育领域外国直接投资政策的自由化过程中。但是，外国直接投资自由化只是跨国教育的促进因素，而非催化剂。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将利用经合组织教育研究与创新中心 (Centre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提出的四种根本原因来解释跨国高等教育的扩张现象。

相互理解

相互理解理论强调教育国际化的学术、文化、社会和政治基础，而不是将教育看作

一项经济政策的一部分。根据这种理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政策是为了通过在政治和商业精英之间创建网络来加强国家之间的联系。例如，很多西班牙高校（尤其是天主教高校）显然是为了扩大西班牙在拉美发展中国家影响而开展跨国高等教育项目的。

人才迁移

该理论认为，国际化意味着吸引外国学生，并鼓励他们在毕业之后留在受教育的国家，为该国的知识经济贡献力量。德国就是采用这种方式的国家。这种方式更加致力于把学生带到提供教育的国家，而不是把跨国教育送到接受国。但是，跨国教育项目可以作为一种供应战略，促进学生向教育提供国流动。

经济收益

经济创收理论强调注重市场和贸易的跨国高等教育。这样的跨国高等教育将收入看作招收留学生的一个重要原则。比如英国首相的举措就强调通过离岸教育来扩大教育出口服务的多样性，目前主要侧重于学生流动。同样，近年来一些传统的接受国也表现出对提供跨国教育项目的兴趣，以便获得出口收入并用于教育国际化。新加坡就是采取这一策略的主要国家。

能力建设

最后，能力建设理论认为跨国高等教育是满足当地居民的高等教育需求、提高当地优质教育提供能力（包括水平和规模）的一种途径。这一点对那些本国高等教育体系不能满足国内高等教育需求的国家（例如马来西亚）来说，尤为重要。

可能的收益

上述四种跨国高等教育增长的根本原因并不相互排斥。比如说，提供跨国高等教育的国家可能会从经济收益中受益，而接受国则能够通过能力建设获得提高。在现有的大众传媒和学术文献中，都有对跨国高等教育的大量批评，即认为跨国高等教育非常有利于教育提供国，但是削弱了教育接受国。换句话说，跨国高等教育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北/南（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或西方/东方不平等现象的表现。鉴于不同动机之间的兼容性，用诸如北/南这一两极分化的观点来分析跨国高等教育时就会面临危险。实际上，我们应强调更为平衡的说法，即认为跨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是广泛的，提供国和接受国都可以从中受益。

上述双方受益的理论让我们看到了一幅更加积极的跨国高等教育的画面。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跨国高等教育并非毫无风险。例如，那些只关注收益而不关心跨国教育质量的教育提供者，将削减能力建设的受益程度。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恰当地使用监管机制来对这些教育提供者进行管制。如果因为这些无赖的教育提供者而否定跨国教育的所有发展，那么对于能够带来收益的好的跨国教育是不公平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就是这方面的典范。然而，并非所有国家都具有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监管能力来管理跨国教育的增长。缺乏监管能力和执行力的国家，可能需要在参与跨国教育的过程中，巩固自身的高等教育机构。因此，虽然未受控制的跨国教育确实具有危害性，但是监管体制的存在可以将危害最小化。在有关跨国高等教育受益者的讨论中，大众传媒和学术共同体都应提出更加平衡的看法。

作者注：本文表达的观点纯属个人观点，不代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官方政策或立场。

政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高等教育：一项个案研究

Alma Maldonado-Maldonado 和 Antoni Verger

Alma Maldonado-Maldonado: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
电子邮箱: almaldo2@gmail.com

Antoni Verger: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都市与国际发展研究所 (Amsterdam Institute for Metropolitan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udies) 讲师; 电子邮箱: a.verger@uva.nl

2009年7月8号下午5点(巴黎时间), 世界高等教育大会(World Conference on Higher Education) 筹委会主席宣读了大会的最后公报(详细内容请见: <http://www.unesco.org/en/wche2009/resources/conference-documents/>)。到会的199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代表一致通过该公报并鼓掌欢呼。据筹委会主席汇报, 共有20名观察员密切关注了公报起草委员会的工作。本文的两位作者正是其中的观察员, 将给大家提供一些最后公报宣读之前所进行活动的幕后消息。与大会召开期间总体上的平静氛围相反, 在公报的起草过程中, 成员国之间开展了激烈的争论和紧张的谈判。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通过的最终公报很有意义, 有助于全球对高等教育的定义以及政府和利益相关者所面临的挑战形成共识。因此, 我们认为有必要详细介绍第二次世界高等教育大会最后公报撰写过程背后的事件和“高等教育政治”。

起草过程

在世界大会之前, 召开了一系列的地区性会议。每一个地区会议的最后公报都是起草委员会最终公报初稿的主要来源。起草委员会包括17名教科文组织成员国(德国、法国、美国、委内瑞拉、印度、巴西、牙买加、罗马尼亚、阿塞拜疆、巴基斯坦、马达加斯加、刚果、摩洛哥、南非、中国、巴勒斯坦

和苏丹)的代表、1名主席(来自俄罗斯)、1名教科文组织代表、4名高等教育专家、3名利益相关者【国际大学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国际教育组织(Education International)和欧洲学生联盟(European Students' Union)】的代表、2名文书和3名起草员。

为了起草最后的文件, 起草委员会在三天的时间内, 共召开了五次会议。第一天的两个会议讨论了起草工作的一般程序。第二天开始讨论内容, 召开了两次会议, 分别是在中午和晚上。晚上的会议7点半开始, 一直到凌晨2点才结束。毫无疑问, 这一天是最紧张的起草日。

三个有争议的问题

在起草过程中, 很多政治讨论都主要是围绕以下问题展开。

对高等教育的界定。在达成共识的过程中, 最复杂的问题是如何界定高等教育。在初稿中是这样界定的: “高等教育在国家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公共产品, 高等教育一定是各国政府的责任。”在修改后的最后公报中, 提法变成了: “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各级教育的战略必需以及研究、创新和创造的基础, 一定是各国政府的责任, 必须受到政府的经济支持。”此外, 在初稿和终稿之间, 还有其它的提法, 比如

第三稿中的“高等教育是一种社会公共产品和人权”；或者第五稿中更加市场化的定义，即把高等教育视为“公共服务”。拉美国家的代表强烈赞同第三稿中的提法，然而美国却不愿意接受“公共产品”的提法。为了解决这一主要分歧，需要进行更多的协商。在大会的最后一天，印度和巴西的代表与美国的代表进行了协商，想让其接受“公共产品”的提法。我们不清楚协商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但有可能是删除了下文即将提到的有关《服务贸易总协定》的一个段落。对美国来说，使用副词“作为”比使用动词“是”（高等教育是一种公共产品）更容易接受。即便如此，对一些国家来说，比如更加支持市场在高等教育中发挥作用的美国，最后的提法还是很有问题的。

《服务贸易总协定》和高等教育中的贸易。在公报起草过程中，对《服务贸易总协定》的争论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初稿中写道：“服务贸易是全球化的一个表现，引起了学术共同体的很大关注，特别是对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关注。成员国不应该把高等教育看作是一种商业交易……”这一次，争议又出现在美国 and 拉美国家之间。拉美国家的代表迫切要求在公报中保留这一要点，因为这样会加强他们把高等教育作为公共产品的观点。但是美国反对将其纳入公报，声称教科文组织不是讨论《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地方，高等教育国际市场可以与更受国家驱动的高等教育共存。

罗马尼亚也支持美国，声称该国已利用《服务贸易总协定》实现了本国高等教育的自由化。因此，罗马尼亚的代表认为，鉴于本国在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环境下的做法，如果接受初稿中的内容，就会出现不符合实际的情况。在对高等教育是否

是商品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后，巴西和委内瑞拉的代表居然同意删除上述段落。因此，最后的公报中没有提及《服务贸易总协定》及相关内容。

全球大学排名。对于这个问题，初稿中写道：“全球化增加了对高校进行比较的压力，导致了国际排名的产生。这一种对比方式应该包括一系列体现不同制度、高校和高校类型的目标和宗旨的指标，从而促进高校的多样性”。第二稿将其修改为：“为了让比较有用，必须在体现制度和高校使命多样性的质量数据和恰当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比较”。“排名”一词在该稿中被删除，在之后的修改稿中也没有再出现。印度的代表不断地强烈要求在公报中删除排名这一概念。我们不清楚他们反对使用这一术语的原因。对于这一争论的“解决办法”，就是去掉那些存在强烈异议的问题，不再进行讨论。

最终结果

起草公报的第三天必须通过终稿。时间上的压力、各成员的精疲力竭、以及在走廊里最后一分钟的协商等因素加在一起，实现了完成最终公报起草这一目标。最后的结果就是，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因为被简单排除在公报之外（如对《服务贸易总协定》和排名的讨论）而得到了解决（或者“悬而未决”）。另一个促成各国达成共识的原因则是没有人愿意拖延起草过程，并因此独自承担大会失败的责任。

总而言之，为了满足涉到的各种利益和观点（包括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发展需要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强烈市场倾向），6个过程草案对于最后公报的完成都是需要的。对拉美国家来说，他们的态度解释了该地区政府强烈要求在公共服务（包括高等教育）提供中

发挥重要作用的左倾浪潮。就美国来说，它在教科文组织中传统地位的变化没有反映出新政府的影响。由于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公报起草过程中的这些紧张情况，结果就是最终形成了一份冗长但却支离破碎的公报。而在我们看来，公报并未向国际高等教育界传达

出明确连贯的信息。然而现在就判断公报的政治意义还为时过早。我们希望这些内幕记录有利于解释 2009 年世界高等教育大会最终公报的产生和内容，尤其是那些被省略的部分。

高等教育国际招生的未来

Madeleine F. Green 和 Kimberly Koch

Madeleine F. Green: 美国教育委员会国际化项目副主席;
电子邮箱: madeleine_green@ace.nche.edu

Kimberly Koch: 美国教育委员会前任项目助理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估计,全球约有280万留学生,而1999年只有180万。教科文组织所指的留学生是那些在国外接受教育的学生,其中不包括在国外学习时间少于一年的学生。

政府和高校支持国际招生的原因多种多样,如经济收益、文化外交、吸纳精英人才来提高创新力和生产力以及促进学校的国际化等。尽管在国外接受教育的学生数量正在增加并且可能持续增加下去,但对留学生的竞争却很激烈。

我们研究了高等教育中留学生数量位于前五名的接受国(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澳大利亚),总结了它们在吸引留学生方面的做法和影响未来发展趋势的因素。

前五名接受国

在2006/07学年,美国的留学生数量最多(595,874人),所占份额也最大(20%)。在此要做一说明,由于定义的不同,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据不同于被普遍引用的国际教育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的数据。英国的留学生共有351,470名,占全球留学生总数的13%。法国和德国各有246,612和206,875名留学生,都约占全球总数的8%。澳大利亚有211,526名留学生,占全球总数的7%。

以上数据只呈现了部分现状。澳大利亚

的留学生数量占其国内高等教育在校生总数的17%,而美国的留学生数仅占总数的3%。此外,澳大利亚2007年的留学生数量比2006年增长了15%,高等教育成为国家第三大出口业。英国、法国、德国的留学生数量分别占总数的14%、11%和11%。如果留学生被看作本国正接受高等教育者的一部分,那么他们的影响力就变得明显了。

招生策略

前五大接受国中,除了美国,其他国家都开展了国家层面的招生活动,并开办了一个专门的网站。每个国家都提出了不同的招生口号,例如法国的“选择法国”、澳大利亚的“生活、学习和成长”、英国的“创新、个性与灵感(Innovative, Individual, Inspirational)”以及德国的“创意之国(Land of Ideas)”。各个国家都有提供信息和各类营销活动的官方或半官方组织。德国的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eutscher Akademischer Austausch Dienst, DAAD)就是高校和政府之间的中介机构,在全世界有64个办事处。英国政府已经制定了有关留学生的国家目标,在一百多个国家都设有办事处的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发挥着营销作用。2006年建立的法国教育服务中心(CampusFrance)取代了法国教育国际协作署(EduFrance),共在75个国家设置了100

个办事处。澳大利亚最近在国际教育方面投入资金 280 万澳元，重点关注亚洲六大留学生输出国。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协会 (Australia Education International)，作为澳大利亚教育、就业和劳动关系部的国际助手，在 17 个国家设有 25 个办事处。美国缺乏一项统一的国家战略，每所高校承担着主要招生责任。美国国务院开设了一个网站，通过 450 个美国大使馆的广告中心提供相关信息。

签证政策

获得签证的难易程度和费用是影响一个国家吸引留学生能力的重要因素。2001 年的“9·11 事件”之后，美国留学生数量有所下降。在“9·11 事件”刚刚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学生在申请签证时不仅遇到拖延情况，而且还需要在大使馆进行面试，增加了申请时间和费用。2009 年，英国实施了一个新的计点积分制 (points-based system)，该制度实施中的问题已被媒体报导。澳大利亚允许持有学生签证的学生每周工作 20 个小时，但与此同时却收紧了学生毕业后成为永久居民的政策。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入境签证费用最高，分别为 427 美元和 331 澳元。德国和法国的费用最低，分别为 86 美元和 70 美元。但法国收取额外的居住许可费用。

奖学金

上述五个国家都为留学生提供奖学金。

可收集到的信息表明，澳大利亚、英国、德国和法国都正在根据国内高等教育的规模，投入数目可观的资金。美国投入最多的富布莱特国外学生项目 (Fulbright Foreign Student programs) 提供 3,200 个奖学金名额，共计 9,500 万美元。英国提供 1,885 个志奋领奖学金 (Chevening scholarships) 名额，共计 4,800 万美元。澳大利亚最大的项目发展奖学金 (Development Scholarships) 提供 1,000 个名额，共计 8,500 万美元。法国和德国都分别提供价值约 1 亿欧元 (约合 1.5 亿美元) 的奖学金。

结束语

影响未来留学生分布的因素很多，包括接受国教育机会的吸引力和质量、国家层面统一的留学生招生战略是否成功、学校和签证申请是否容易。此外，现在已经出现了新的竞争对手，包括中国、马来西亚、日本、新加坡和波斯湾国家在内的一些国家，正在努力成为卓越中心和地区教育的中心。离岸教育的增长趋势使学生在本国或本地区就可以接受留学教育。这一选择可能会越来越具吸引力，因为对学生来讲费用大大降低，而对政府来讲则可以避免人才外流。所以，并不总是能够根据过去的情况预测未来的。

权力和大学校长

Amanda Goodall

英国华威大学华威商学院研究人员、利弗休姆学者 (Leverhulme Fellow)

电子邮箱: Amanda.Goodall@wbs.ac.uk

笔者一直以来的研究重点是: 研究型大学应该由谁来领导? 是那些善于管理的人, 还是那些知识渊博的学者从根本上讲更合适? 在发表于本刊的几篇文章中 (2006年和2007年), 笔者基于统计数据, 提出了顶尖学者出身的大学校长能够提高研究型大学业绩的观点。通过对大学校长的访谈, 我总结了4种可能的原因解释上述观点。首先, 杰出学者出身的大学校长能够从本质上理解大学的核心职能, 即研究与教学。其次, 学者型的领导很可能会提出更高的学术标准。第三, 选顶尖学者作校长本身, 也标志着一所大学的优先发展的重点所在。最后, 他们在学术同行中具有较高的公信力。

校长和大学的战略

就承担某些工作 (如制定大学战略、聘用高层人员) 需要多大权力的问题, 我访谈了英美两国的19位大学校长, 其中包括宾夕法尼亚大学、哈佛大学、洛克菲勒大学、康奈尔大学、牛津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曼彻斯特大学、南安普敦大学等学校的校长。

当被问及“你认为制定大学战略是谁的职责?” 时, 这些大学校长的回答惊人地一致。很多校长都略微或毫不犹豫地说, 确定大学的发展方向是校长的职责。他们普遍认为, 只有校长才可以提出“我们要向什么方向发展? 战略是什么?” 这样的问题。他们

还指出, 学校其他高层中可能会存在争议, 但校长是战略的最终决定者。接受访谈的校长都认为, 如果战略决策权下放到下级, 领导者就会失去控制力, 尤其是在学术发展方向上。

与美国的大学相比, 校委会在欧洲的大学往往具有更多的权力。但是访谈显示, 英国的大学校长已经开始拿走某些权利。英国的大学校长们强调, 校长与校委会的职责不同。他们认为, 制定并批准大学的战略是校长的职责, 而不是任何委员会的职责。

很多研究者都认为, 要想成功地领导一所大学, 校长就需要拥有权力。同样, 如果一所大学过于“民主”, 就会变得没有效率。很多欧洲大学的衰落在一定程度上都归咎于其冗赘的决策程序, 尤其是由选举产生的委员会成员制定决策时。政治学研究者可能会将其称之为“多数的专制” (tyranny of the majority)。能够在欧洲大学里存在的共识性决策制定方式有利于维护现状、限制校长的行动, 因此减少了变化的可能性。事实上, 有些学者认为, 一些全球顶尖大学 (如常春藤盟校、斯坦福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 的校长可能具有最大的直接权力。大学的校长被予以做出决策、引导学校发展方向以及承担责任的职责。这也是校长的工资往往在大学中最高原因所在。如果学校的治理机制运作良好, 强有力的大学校长就有益于大学。

选择一流的管理团队

大学校长的另一个权力是聘用高层人员。美国的大学校长都有这样的权力。研究型大学的领导有很多级别：校长下面是教务长、副校长、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核心战略单位的领导（如院长或系主任）。如果一位校长想要执行战略或扩大自己的影响力，那么教务长和副校长的选聘就非常重要。在美国大学，通常由校长选聘高层人员并决定其他重要岗位的人员聘用。但是这样的做法在英国较少，在欧洲其他地方更少。

接受访谈的12名英国大学校长几乎都抱怨自己在选择高层成员之前，需要改变或调整选聘过程。对其中一些校长来说，这一选聘过程不仅缓慢，而且需要大量的谈判。一位英国大学校长抗议说，其行动受到副校长们长达两年的阻挠，一直到他们任期结束。在这所大学，副校长由大学评议会任命，而大学评议会有200名成员。尽管这种选聘模式在英国非常普遍，但很多接受访谈的大学校长已经开始施展自己的力量。一些英国的大学校长把高层人员聘用权列入自己的聘用协议中。有位经验丰富的大学校长在被要求接管一所苦苦挣扎的差大学就是这么做的，他新聘了一名副校长、一名主要运营主管和一名教务长。还有一位大学校长则威胁说要辞职，除非赋予其选聘高层成员的权力。

共同治理（collegiality）并不是指每个人都做决定。英国大学校长的这种果断也是刚刚才出现的。因此，在英国的研究型大学，

高层人员的选聘权正在逐渐仿效美国的模式。在英国新建的大学（即1992年以后由理工学院改建的大学），校长普遍具有聘用高层人员的直接权力。

通过教师选举大学校长的传统做法，仍在很多欧洲大学里实行。这种做法受到了批判，因为它严重削弱了校长的权力，妨碍了组织改变，有利于维持现状。美国一位富有经验的前任院长说，他强烈反对由教师选举教务长和校长的做法，并且还说自己“反对民主这个概念”。这个观点值得注意。很多学者都认为大学是共同治理的，采用民主方式制定决策，因此没有等级科层。但这位前任院长认为，大学至少和军队一样等级分明，人们对所谓的痴迷就体现了这一点（在德国，“Professor Dr Dr”的称谓并不是不常见）。

大学校长的确需要权力。虽然英国的大学校长变得越来越果断，但美国大学校长的执行权力仍远远多于欧洲大学校长。世界最著名的研究型大学在美国，而且它们的表现超过了欧洲同行。校长在精英组织里是否具有充分影响力可能就是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之一。

作者注：更多内容请参见笔者所著的《董事会会议室中的苏格拉底：为什么研究型大学应由顶尖学者领导》（*Socrates in the Boardroom: Why Research Universities Should be Led by Top Scholars*），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印度私立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方向

Pawan Agarwal

印度西孟加拉邦政府高级公务员

电子邮箱: apawan08@gmail.com

在印度,私立高等教育的在校生数量占高等教育在校生总数的1/3以上,占高等职业教育在校生总数的4/5。尽管印度很早就有完全依靠私人投资的教育机构,但私立教育机构的疯狂增长是新近才出现的现象。目前,已有的私立教育机构正通过建立新校园、开设新专业、拓展新领域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并扩大规模。因此,连锁性的私立教育机构正在出现。

在以前,通常是代表某个共同体或宗教组织的少数信托机构和慈善组织创建连锁性的私立教育机构,然而如今这样的机构通常是某个家族所有。这些私立连锁教育机构并不是处在高等教育的边缘,而是高等教育的主流。这些机构不同于连锁性的培训中心,例如以其开创性的特许经营模式而在信息技术培训领域具有较大份额的国家信息技术学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大部分私立连锁教育机构在建立之初规模都比较小,随后逐渐发展壮大。现在,所有的私立连锁教育机构都在大肆扩张。

早期的私立连锁教育机构

在这些私立教育机构中,位于彼拉尼(Pilani)的博拉理工学院(Birl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Science)建立最早,可能也最富盛名。该学院由于教育项目多种多样、与工业界的强大联系,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这所学校创建于20世纪初期,当时只是一个很小的学校;直到1964年才发展成为拥有人文科学、工程技术等众多学科种类和学院的高等教育机构,并在当年将各学院合并成一所私立大学。通过在国内的果阿(Goa)、海德拉巴(Hyderabad)以及国外的迪拜建立分校,博拉理工学院现已成为一所拥有9,000名在校生、19,000名校外成人学生的多校区大学。

以玛尼帕尔大学(Manipal University)为旗帜的玛尼帕尔教育集团(Manipal Education Group),在如今印度国内的职业教育和远程教育中处于领先地位。该集团始于1953年,当时只有一个医学院。现在已成为拥有24个学院、在校生人数超过8万、设有各种层次学科专业的连锁教育机构,使位于南海岸的平凡小镇玛尼帕尔成为一个主要的高等教育中心。该集团创建之初主要进行工程和医学教育,目前也提供人文和社会科学教育。该集团很早就意识到全球化的机遇,有效地处理了品牌资产和国际扩展之间的杠杆效应。集团投资了9,000万美元,正在改善玛尼帕尔的设施并新建4个校园(印度每个校园投资的大约为2,500~3,000万美元)。为巩固在尼泊尔、马来西亚和迪拜的海外地位,该集团2008年获得了安提瓜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of Antigua)的股份并进入加勒比海地区医学教育市场,随后很快打算进军阿曼、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教育市

场。该集团的国际运营收入占其总收入的一半以上。

1971年在普纳(Pune)建立的共生教育机构(Symbiosis),自成立之初就面向国外学生。现在它的9个分校共有33个机构,在校生达4.5万名,远程教育学生达10万名。在2002年,该校被授予等同于大学的地位(deemed-university status)。由于招收的学生来自60多个国家,该机构在2006年更名为共生国际大学(Symbiosis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有着40年历史的安博基教育学会(Apeejay Education Society),已从最初的高中发展成为高等教育机构,目前在全国拥有13所高校、32,000名在校生。

新建的私立连锁教育机构

印度注册金融分析师学院(Institute of 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s of India)建于1984年,旨在为学生、行政主管和专业人士提供金融和管理培训,以及提供在国外倍受欢迎的注册金融分析师的培训。目前,该机构在乌塔拉坎德邦(Uttarakhand)、特里普拉邦(Tripura)、锡金(Sikkim)、梅加拉亚邦(Meghalaya)、米佐拉姆邦(Mizoram)、那加兰邦(Nagaland)和恰尔肯德邦(Jharkhand)等地拥有7所私立大学,并计划在拉贾斯坦邦(Rajasthan)、恰蒂斯加尔邦(Chhattisgarh)和旁遮普(Punjab)再建3所新的大学。每所大学都是独立的法人实体,提供全日制的本科和硕士生教育,并在多个学科专业采用灵活的学习方式。虽然成立的时间较短,但印度注册金融分析师学院现已成为国内最大的连锁大学,在校生达数十万。

十年前刚刚成立的亚米提大学(Amity University),现拥有2所大学和70个教育机构,为50,000名学生提供130个专业的教育,

涉及理科、人文、传媒等各领域。迄今为止,该大学已投入2.2亿美元的资金,并且打算在未来的2到3年内再投入4.5亿美元,在未来5年内将在校生规模提高到500,000人。该大学声称自己在过去的5年间一直保持50%的增长速度,并且打算以后每年成倍提高其学生数和总收入。

位于哥印拜陀(Coimbatore)的PSG集团(PSG Group),目前拥有19个学院和16,992名在校生,并且正在筹建一所大学。班加罗尔(Bengaluru)的耆那集团(Jain Group),拥有21个教育机构、16,400名在校生和1,750名员工,计划在未来十年内建立100个学院。

新的私立连锁教育机构正在印度各个邦县出现。甚至连私立职业教育落后的邦县也都出于实用的目的,创立了私立教育机构。西孟加拉邦的印度科技集团(Techno-India Group)旗下有14所职业教育机构,分别设在孟买、德里和班加罗尔等地。

私立连锁教育机构的未来

连锁的私立教育机构,其运营受运营效率和营销策略的支配。这些连锁机构共同享用一个品牌名称。这一做法不仅是一种营销手段,也是一种战略,即宣称它们的教育不仅是有效的,而且可通过克隆的机构提供给那些无法抵达机构最初设立地点的人们。

虽然私立连锁教育机构的一些连锁点具有一定的自治权,但私立连锁教育机构核心理念则是对所有课程、教育、聘用和招生采用同一套标准,以此来实现高效的运作。随着连锁机构在国内的扩张,它们往往采用标准化管理这一商业组织普遍使用的方式来建立运营管理框架。

私立连锁教育机构的资金(包括经常性

成本和扩张资金)大部分来自学费。由于规模效应和不断增加的需求,这些机构能够通过自己的经营获得大量盈余。自印度税法不限制非营利机构的再投资而限制其发起人分享盈余以来,私立教育机构的大部分盈余又被用于扩张与建设。因此,私立连锁教育

机构可能会持续扩张,并在将来成为印度高等教育的支柱性力量。

作者注:本文阐述的都是笔者的个人观点。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见笔者所著的《印度高等教育:展望未来》(Sage, 2009)。

哥伦比亚的私立高等教育：问题和成就

Lina Uribe

美国奥尔巴尼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系统）私立高等教育研究项目博士研究生、哥伦比亚
Institución Universitaria de Comfacauca 校长

电子邮箱: lu625667@albany.edu

在拉美地区，哥伦比亚在私立高等教育多元化发展方面，长期以来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事实上，哥伦比亚高等教育中私立高等教育所占的比例曾经高达 68%，历史上只有巴西达到过这一记录，智利也是最近十年才达到这一比例的。私立高校在 1975 年成为哥伦比亚高等教育中一个主要部分，但在 20 世纪 60 年代，私立高等教育已经在努力扩大规模了。目前，哥伦比亚私立高校的在校生数约占全国总数的一半。1997 年到 2007 年的学生人数的下降可能只是短暂现象，因为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08 年私立高等教育的增长超过了公立。

在哥伦比亚，私立高校的数量是公立高校的两倍多。在 279 所正式注册的高校中，197 所是私立高校。这些私立高校在规模、目标和办学层次方面多种多样。这种趋势有助于增加低收入人群的入学机会，以及实现不同的功能和目标。然而，在这样一个如此依赖私立高等教育的体系中，质量已成为大家特别关注的对象。不管下文如何讨论该国私立高等教育的问题与成就，我们首先应该明确，哥伦比亚具有较大比重的私立高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大的政治历史趋势和公共政策所造成的。

世俗和宗教的私立教育机构

哥伦比亚的高等教育最先受到西班牙教

育文化的影响。哥伦比亚的第一批大学基本上都是私立的，数量超出了其他殖民地。它们由天主教团体建立，在殖民地晚期受西班牙皇室统治。其中一些重要的高校包括如今的圣托马斯大学（Universidad de Santo Tomás，1580 年建立），哈维里亚纳天主教大学（Universidad Pontificia Javeriana，1623 年建立）和罗萨里奥大学（Universidad del Rosario，1653 年建立）。

由于民族解放者追求国家独立，他们在哥伦比亚国内创建了国立公办大学来巩固共和国。但是，无论是尽力领导新政权的党派企业，还是倡导世俗非政治高校的知识分子，都在扩张私立高等教育。保守党领导人倾向于在教育中给教会以重要地位，而自由派则通过创建新的世俗高校来应对保守党的做法。

20 世纪后半叶，哥伦比亚的私立高等教育从完全面对社会精英，转向满足中产阶级不断增长的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哥伦比亚成为拉美国家中非精英高校最多的国家。

国家对私立高等教育的促进

在哥伦比亚，私立高校的扩张和多样化也受到国家政策的推动。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国家无法大规模扩大公立高等教育，因此哥伦比亚政府支持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以满足广大民众对大学和非大学机构的需

求。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支持私立高等教育扩张的主要“公共政策”仅仅是国家缺乏对公立高等教育扩张的投资。

对最新改革的分析表明,哥伦比亚的公共政策虽然迟缓,但已经开始更积极地关注高等教育的学术质量。除了2001年开始采用的复杂的质量保证体系外,政府还出台了激励私立高校公开竞争公共经费的措施,即在实现其招生目标的同时,通过对项目的支持来提高质量。由于这些政策都是近期才出台的,它们能否有效解决最底层高校的质量问题尚不明确。

私立高校的多样化、大众化和质量

哥伦比亚大约15%的私立高校由宗教团体创建,但也有一些私立高校最初由工业或知识分子建立。很多私立非精英高校都归家族所有,在对营利的渴望和哥伦比亚禁止营利的立法之间左右为难。许多家族通过让家族成员在学习中任职和高薪,以及向本校出租房屋来谋利的做法,明显成为人们批评的对象。这些做法不仅损害了私立高校的收入和可持续发展,而且也成为所有者在虚伪的“非营利”外衣下逃税的途径。

大众化也导致了私立高校在合法性和质量上的多样性,即从最底层的高校到半精英或地方性私立精英高校都有。与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一样,哥伦比亚扩大入学机会的政策导致了底层高校教育质量低下这一不可避免的问题。由于该国高等教育吸收了62%的高中毕业生(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2年为37%),很多私立高校招收了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在哥伦比亚,私立高等教育在招生数和教育质量之间的折中做法,反映了提供优质教育的选择性大学和非选择性大学之间的差别。

造成底层私立高校质量低劣的主要原因在于管理措施(如预算或发展规划)的缺乏和全职教师的稀缺。很多质量低下的私立高校都依靠兼职的公立大学教师,而这些教师通常在不止一所私立高校兼职。哥伦比亚底层私立高校在雇佣教师和支付薪水方面有困难,一些私立高校在租来的设备不足的大楼里开展教学和研究。当然,随着政府改变现状的控制措施的实行,也有一些私立高校进行了有价值的尝试,同时追求招生数量和教育质量。

对质量的追求

虽然哥伦比亚的私立高等教育存在上述问题,但私立高校也引领了自愿进行高质量认证的运动。国家认证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f Accreditation)的数据显示,私立高校占通过认证的高校总数的63%。其中约有12所获得认证的私立大学可以被视为高水平大学,它们不仅提供博士学位教育(特别是在卫生、法律和社会科学专业),而且拥有训练有素的教师。

诚然,没有一所哥伦比亚的高校出现在注重研究的全球大学排名中,例如《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的全球大学排名和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处于领先地位的私立洛斯安第斯大学(Universidad de Los Andes)是唯一出现在全球大学网络计量排名(Webometrics.info,以电子出版物的知名度、规模和质量为指标)500强中的学校。洛斯安第斯大学在私立高校中博士教育项目数量最多。

虽然这种分类非常不精确,但可能还有30所五年制私立高校在国内或本地区享有声誉,因为其本科教育获得了公众和学术界的认可。我们还可以发现其他74所具有明显

“需求吸收型”特征的私立高校。此外，还有 81 所非大学的私立高校，提供两年和三年学制的教育项目。由于哥伦比亚“需求吸收型”和非大学的私立高校很少拥有获得认证的教育项目，因此它们的质量和合法性更取

决于具有保证质量的基本条件。哥伦比亚所有高校都必须具备的这些基本条件由学术同行和教育部负责评估，这也是质量保证体制的一部分。

中国的本科教学评估：成绩与问题

蒋凯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电子邮箱: kjiang@pku.edu.cn

中国的高等教育规模在过去的十年急剧扩张。与1998年相比,1999年高等教育的招生人数增长了49%,2000年又增长了25%。200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而1993年仅为5%。现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以每年2,700多万的规模,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

在中国高等教育快速扩张的背景下,数量的增长成为优先考虑的问题。政府鼓励高校,尤其是地方高校招收更多的学生。但在这个过程中,高等教育的质量在某种程度上被忽视。对质量的忽视带来了很多问题,例如生均教育经费的减少、教学条件的恶化、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困难等。雇主、学术界和公众都对教育质量产生了质疑。中国政府担心如果没有严格的质量保证,扩张本身可能不会提高国家和个人的竞争力。

目前,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已从数量增长转为质量提高。中国政府和高校正在认真思考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

采取的主要措施

为确保教育质量,中国政府采取的一个关键措施是对高校开展全国性评估。原国家教委1994年在全国普通高校开展了一项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试点工作,此后在1996和1999年又进行了两次评估。经过这几次试点工作,结果表明被评估的高校往往会改善其校园和教学设施、增加教育开支、密切监

控教学质量并重视教学。

2004年成立的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 Center, <http://www.pgzx.edu.cn/>)是本科教学评估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在为期5年的第一轮评估中,评估中心对589所普通高校进行了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尽管评估中心将发展成为综合性的准官方评估机构,但它是从全国本科教学评估开始起步的。教育部坚持认为,本科教学尤为体现高等教育的质量,因此本科教学必须得到加强,而不是被削弱。

对普通高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的评估包括三个阶段:高校自评阶段、评估专家组进校考察阶段以及高校整改阶段。评估中心开发了一套复杂的评估指标体系,包括7个一级指标和19个二级指标。教育部及评估中心都认为评估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手段。

本科教学评估是继“院系调整”(20世纪50年代早期为促进国家的工业化而采取前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之后,最具深远影响的高等教育改革。

此外,各省教育行政机构也采用与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相同的工具和指标体系,对各自的高职院校开展了专科教学评估。大部分民办高校的教学工作由教育部评估中心或省级教育行政机构进行评估。

影响和争议

教育部和评估中心认为,第一轮的本科

教学评估成效显著，与1996和1999年评估的效果相似。但尽管如此，教育部前部长周济承认评估也存在一些负面影响，如形式主义、造假和欺骗。此外，单一的评估指标体系限制了它对不同类型高校进行评估的益处，同时评估成本（尤其是隐性成本）非常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大多数院校在被评估之前面临很大的压力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但80%以上的高校在第一轮评估中都被评为“A”。

学术界、管理者、学生、政府、公众和媒体都参与到对本科教学评估的影响及其未来发展方向的讨论之中。其中，两位国内重点大学校长2008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中国最有影响的报纸）上的两篇文章提出了完全对立的观点。曾担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在评估中心成立前负责教学评估工作）司长、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纪宝成，批评大学评估太多太滥，认为应该给大学更多的自治权（包括评估）。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的立场则完全相反，认为对高校的教学评估十分必要。他指出，中国的高等教育评估有着牢固的法律基础，对教育质量进行监控是一种国际惯例。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评估本身不能被废除。根据他的观点，如果教学评估能成为质量保证的常规手段，就不会干扰高校的日常教学。

尽管本科教学评估仍受到热议，但教育部一位副部长指出，中国将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努力加强高校评估工作。组织开展评估是政府的责任，接受评估则是高校的义务。

本科教学评估未来的发展

根据第一轮本科教学评估的正面和负面影响，教育部和评估中心正在努力改善评估。本科教学评估的新方向将包括三个方面：第一，高校内部的质量保证机制胜于政府推动的外部监控机制。第二，为避免高校成为评估的被动接受者，将为它们提供更多的机会，使之在高校评估中发挥积极的引领作用。第三，将减轻大部分高校参加漫长而紧张的评估时所承受的压力。人们逐渐意识到，本科教学评估不仅仅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政府措施，也是更多利益相关群体的一种问责措施。这些利益相关群体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高校、学者、管理者、学生、家长和媒体。

虽然制定全面而完善的高等教育评估体系仍需很多努力，但中国特色的全国本科教学评估仍是国家确保并提高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据报道，教育部将于2009年年底，由评估中心开展下一轮为期五年的本科教学评估。在新一轮的评估中，将采用一些新的教学评估方法。

中国的学术自由和公共知识分子

查强

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 (York University) 教育学院副教授

电子邮箱: qzha@edu.yorku.ca

人们一直认为中国的学术自由存在问题。近来在高校发生的学术诚信危机和政府干预,再次把这个问题推到风口浪尖。自2002年起,中国教育部颁布了一系列措施来清除高校中的学术腐败。就在不久前的2009年3月,教育部又宣布了对学术不端行为的严厉惩罚措施。那么,中国高校学术自由的现状如何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回顾一下儒家的知识分子传统,因为它对学者与国家关系的看法非常不同于西方国家。本文首先回顾中国的学术自由,然后找出它在上个世纪的演变历程,以期探究当代中国高校学术腐败的原因。

知行统一

与西方学者相信话语权力、通过参加批评辩论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传统不同,儒家传统鼓励中国学者用行动和直接承担国家管理责任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这种传统在儒家知识经典和选拔知识分子成为士大夫的科举制度中最能体现。知识不仅是认识世界的途径,更是改变世界的途径。人们期待学者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说得再明确点儿,学者通过自己士大夫的身份,追求知识和行动的统一。他们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社会批判者,而是用知识分子的权威(intellectual authority)抵消政治的权威,并有责任“驯化”统治者,让他们成为的“哲学家式的国王”。虽然势必存在犬儒主义和腐

败,但这种士大夫的角色并不一定限制儒家学者的独立思考能力。更多的情况下,人们认为士大夫用自己“坚强的臂膀”维护着社会公平和道德。

百年沉浮

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促使独立知识分子阶层产生。1919年的五四运动(通常被称作中国的启蒙运动)摧毁了儒家传统,中国学术界开始出现激进主义和功利主义。前者导致了革命行动主义(revolutionary activism),后者导致了中国学者中犬儒主义者不断增加。从那时起,中国的学者似乎就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五四运动见证了激进知识分子的产生,其中很多人随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贡献。1957年,当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上抨击斯大林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正积极投身“百花运动”。他们建议新中国政府应该“民主治国”并接受批评。此举被认为破坏了有益的批评,于是出现了反右运动。很多高校的知识分子都被打成“右派”,并被下放进行劳动改造。

反右运动让中国知识分子感觉到自己是被怀疑和迫害的对象。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他们不再发言,其中一些人变得愤世嫉俗。这对60年代初的大饥荒和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出现可能具有影响。当邓小平开展逐步实现市场经济的一系

列经济改革的时候，中国政府也在探索如何解决有争议的新政策所引发的矛盾。知识分子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号召下，再次受到鼓励，积极投身于改革。20世纪80年代，出于对中国经济落后和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想的不满，很多知识分子都怀有追求自由和民主的强烈信念。因此，那个年代是第二个启蒙时期，高校教师普遍认为改革还不够。在目睹了戈尔巴乔夫名为“政治开放（glasnost）”的政治自由化之后，他们希望中国开展类似的改革。

经过了80年代的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与1968年后西方同行类似的转型：知识分子改革者和学术工作者的分离。极少数人依然是自由知识分子，但大部分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退回到大学校园学习知识并开展学术活动。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确实通过提出专业性建议，为各个层面的政策制定做出了贡献，但是他们很少成为社会批评者或社会活动家。他们采取被称作“建设性批评”的立场，而该立场并不必然体现自由知识分子激进的社会责任感。随着学术自由和直接批评政府的西方观点逐渐丧失吸引力，面对中国经济的成功，中国高校里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倾向于“建设性批评”。

中国的学者和学术腐败

1992年以后，中国的快速变化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担忧。在财富持续增长的同时，市场经济也助长了功利主义和对物质财富积累

的片面强调。学者发现自己的精英文化被世俗文化取代。其中一些人被获得权势的各种“捷径”吸引，尤其是在自己学术诚信的意识形态基础被功利主义所取代后。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剽窃变得普遍，甚至在顶尖大学里也一样。《科学》杂志最近一篇有关浙江大学一位研究人员剽窃或捏造数据的文章（2009年3月6日），讨论了中国大学的学术诚信危机及其引起国际关注的问题。这体现了人们普遍的观点：腐败不仅存在于中国的权力领域，也渗入到了学术圈。2009年10月，在国庆60周年成果发布会上，教育部称根据发表的科技论文数量排序，中国高校的科研能力位居世界第五，这立刻引起了高校内外的批评。这些批评指出剽窃事件不断增多、学术诚信不断下降。

由于意识到学术腐败会破坏中国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抱负，政府开始进行干预。以前政府通常被视为学术自由的障碍，现在中国政府成了大学和学者学术诚信的监督员。其他国家正在呼吁知识分子的自治和自律，中国也有这样的趋势。但是由于政治制度和儒家学术传统的中断，中国学者可能更容易受到影响。直到中国学者能表明自己负责任并履行相应的责任时，他们才可能有资格享有西方传统中的自治和学术自由。虽然儒家经典现在被重新引入课堂，但我们不清楚这是否会带来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权威（intellectual authority）的复兴以及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中国高校的多样化

Hubert Ertl、喻恺

Hubert Ertl: 牛津大学教育系高等教育学教师、牛津大学李纳克尔学院 (Linacre College) 教师;
电子邮箱: hubert.ertl@education.ox.ac.uk

喻恺: 牛津大学教育系高等教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研究人员;
电子邮箱: kai286@gmail.com

自1998年起,中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中国教育部的最新数据显示,进入本专科学术学习的学生人数从1998年的100万增加到了2008年的600万。这一增长使2008年本专科学术生总量超过了2,000万,中国由此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高等教育提供者。

随着学生数量的快速增长,出现了一些新型的学位授予高校。正如许美德 (Ruth Hayhoe) 和林静 (Jing Lin) 的一篇文章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2008年春季刊) 所述,民办高校和独立学院 (由公立高校与私人投资者合建), 在学生规模的扩大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就在6年时间里 (2000~2006年), 中国共建立了318所独立学院。目前, 中国1/6的本科生在独立学院或民办高校学习。

本文对中国东南部一座省会城市中的一所独立学院、一所民办学院和两所公立高校等4所高校进行了对比性的探索研究。这两所被对比的公立高校 (分别是一所大学和一所学院) 都已备受认可, 并且遵从政府的规定, 收取同等水平的学费。在中国, 独立学院和民办高校建立的时间都比较短, 收费标准约为公立高校的2.5倍。

在2008年, 本研究所挑选的4所公立大学、公立学院、独立学院和民办学院的本科

招生人数分别为9,000、2,000、3,000和800人。公立学院和民办学院都是几年前刚被升格为学位授予机构的, 因此招生人数较少。那所民办学院的大部分学生都是接受大专学历的职业教育。两所非公立高校的教师大多为公立高校的退休教师。

高考成绩

对所招收学生的分析表明, 进入4所高校的学生类型存在明显差异。两所公立高校学生的高考成绩远远高于独立学院和民办高校学生的成绩。这说明, 独立学院和民办学院对高等教育扩招的贡献在于招收了学习成绩较低的学生。

社会经济背景

四所高校学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存在显著差异。与其他3所高校相比, 独立学院学生家长的教育背景最强, 工作地位最显赫。学生社会经济背景上的差异在两所非公立高校之间最为明显。例如, 独立学院学生的家长拥有高等教育学位的比例是民办学院学生家长的5倍。同样, 与民办学院学生父亲的情况相比, 独立学院学生父亲中公司经理的比例是民办学院的9.5倍, 公共部门行政人员的比例是4倍, 政府部门公务员的比例是2倍, 而民办学院学生的父亲通常是工厂、建筑工人或者农民。对学生母亲职业地位的分

析结果也类似。

城乡来源

四所高校学生的生源地也存在显著差异。独立学院招收的城市学生多于其他几所高校，而招收的农村学生数量（占学生抽样总数的18%）明显低于其他3所高校，公立大学、公立学院和民办学院的这一比例分别为29.6%、24.2%和37.6%。由于中国的城乡分化明显，这种差异不仅和学生的高中学习成绩有关（城市学生的高中成绩整体较高），也和学生的家庭收入水平有关（农村家庭的收入整体较低）。

对学习费用的担忧程度

学生社会经济背景的差异也体现在学生对学习费用的担忧程度上。虽然独立学院的学生支付的学费高很多，但他们对学习费用的担忧程度并不比两所公立高校的学生高。然而，民办学院的学生普遍上更担忧自己的经济负担：45%的学生称他们非常关心学习费用，是其他3所高校同一指标的两倍。这种情况说明，非公立高校的高额学费并不影响独立学院的学生，因为其家庭背景较为显赫，但对民办高校的学生来说却关系重大。本研究还表明，民办学院学生对经济负担的高度关注造成了他们继续深造的愿望低很多。

结束语

独立学院和民办高校在中国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性虽然不断增加，但同时人们对选择机会和公平问题却没有足够重视。例如，来自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较高的富裕家庭的低分考生，通过选择支付高额的学费而进入著名公立大学相关的独立学院并从中受益；而来自贫困家庭的差生支付高额的学费却进入声誉较弱的民办高校学习。为分析不同社会经济背景学生和城乡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后的回报率，迫切需要对不同类型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进行调查分析。

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并没有为大部分学生带来更多的高校选择。事实上，中国高校的多样化似乎是扩招这一总体目标的副产品。只有那些社会经济地位高的群体才有机会进行选择。

民办和独立高校是中国高等教育一个新的组成部分，把几乎全是公立高校的中国高等教育系统转变成了相当一部分学生就读于非公立高校的系统。然而，中国高等教育中一直存在的高校等级强调垂直多样化，高校的声誉存在很大差异。这种做法是以牺牲提供不同教育类型的高校水平多样化为代价的。虽然这种多样化创造了更多的高等教育名额，但它也带来了不同类型高校在相对成本和教育声誉上新的不平等。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俄罗斯的案例

Anna Smolentseva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教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电子邮箱: asmolentseva@yahoo.com

面向知识经济建设的创新发展已经成为俄罗斯的国家重点。在人们公认俄罗斯的高等教育和研究落后于世界上高等教育强国的同时，怀念前苏联教育和科学成就的情绪在全社会依然强烈。

全球大学排名

与其他一些国家一样，全球大学排名在俄罗斯也引发了一场对高等教育和研究现状的批判性思考。俄罗斯顶尖大学在全球大学排名中表现不佳。在上海交通大学 2004~2008 年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莫斯科国立大学的名次在 66~76 之间波动，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则在 400~500 名之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的世界大学排名结果同样令人沮丧：自 2004 年起，莫斯科国立大学的排名在 79~231 名之间变化。

对学术界来说，俄罗斯大学在全球排名中的不佳表现并不足为奇，这只不过是俄罗斯高等教育和研究存在问题的另一个信号。但对其他人来说，俄罗斯大学如此靠后的排名令人难以接受。国内对全球大学排名结果的不同反应，说明俄罗斯社会对高等教育现状缺乏共识。

俄罗斯自己的排名

出于对上述全球排名的方法尤其是排名结果的不满，俄罗斯制作了新的全球排名，并声称新排名更加准确和客观。2009 年，俄罗斯独立排名机构 RatER 公布了新的全球排

名。他们强调，与已有的排名相比，新排名更加关注反映教育和教学质量的指标。这个排名的数据来源包括对大学的调查、教育统计数据、大学的报告和 Scopus 数据库。评价指标包括教育项目（学习的专业）数、发明和专利数、学校信息中心的表现、论文数量及引用、国际奖项、生均预算、在互联网的表现以及留学生情况等。结果，在俄罗斯发布的这一世界大学排名中，莫斯科国立大学排第五名，位居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剑桥大学之前。学术界批判了该排名，认为其方法存在很多漏洞。但是，这个排名还是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因为它是现有排名的一个替代或补充。

国立研究型大学项目

俄罗斯政府关注本国教育的现代化，希望若干所大学能进入全球大学排名的榜单。针对俄罗斯大学在世界大学排名中的不佳表现，俄罗斯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对一批被遴选出来的大学提供支持。2006 年，俄罗斯迈出了建设顶尖大学的第一步。教育科学部（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将几所地方性高校合并，组建成两所联邦大学——西伯利亚联邦大学（Siberian Federal University）和南方联邦大学，以此来加强两个地区的高等教育。从 2006 到 2008 年，在国家优先发展项目的框架下，57 所大学通过竞争获得了联邦政府的资助（每所大学获得

3,300 万美元), 发展自己的创新项目。2008年, 俄罗斯总统签署了一项法令, 授予国立核研究大学 (National Research Nuclear University) 和莫斯科的几所科技大学国立研究型大学的地位, 并在未来十年对其进行资助。2009年, 教育科学部发起了竞争国立研究型大学地位及十年资助的项目, 共 110 所大学应征。联邦政府第一个 5 年 6,000 万美元的资助, 将为大学确定的优先发展学科中的创新项目提供支持。最后, 12 所大学被评为国立研究型大学, 其中绝大部分 (9 所) 是科技大学, 其他分别是下诺夫哥罗德 (Nizhniy Novgorod) 和新西伯利亚 (Novosibirsk) 的两所经典大学和莫斯科的一所经济类大学。

人们希望国立研究型大学改变其法律地位, 从受政府主导转变为享有更多经济自由的自治性教育组织, 尽管这一转变并不是强制性的。与此同时, 俄罗斯议会也将接受有关莫斯科国立大学和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特殊地位的法律。这两所大学将受到联邦政府资助, 可以进行额外的入学考试并颁发自己的文凭。两校校长可能将由俄罗斯总统任命, 尽管政策尚未最后确定。

综上所述, 俄罗斯仿效其他国家确定了精英大学 (或者未来的精英大学), 并为之提供财政支持。这一地位需要通过竞争获得, 意味着应征的创新项目必须具有一定基础, 并且如果某大学不能成功完成所申报的项目, 其国立研究型大学地位将被取消。

然而, 俄罗斯对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政策没有详细阐述。我们不清楚创新的标准, 以及如何创建这种大学? 如何评价该项目在国际舞台上是否成功? 如何衡量在世界一流大学创建过程中的进步? 目前, 这些问题尚未解决。无论如何, 期望俄罗斯大学五年内

在全球大学排名中的地位获得显著提高, 是不合情理的。尤其是论文发表数量和引用不可能如此快速地增长。顺带提一句, 俄罗斯科学院在论文发表数量和引用方面都超过大学。

世界一流大学的文化

需要强调的是, 虽然研究成果、高额预算、高度国际化和先进设备是世界一流大学必不可少的, 但世界一流大学不仅仅是这些。在一个民主的文化中, 研究卓越和教学卓越有许多重要前提: 学术自由、决策过程透明分权、公开竞争。这些价值虽然在许多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遭到破坏, 但是依旧重要。在俄罗斯, 学术自由、同行评议、决策透明和公开竞争的做法仍是不够的, 这种文化因素可能成为追求卓越的一个阻碍。追求卓越需要充足的员工薪水、明确的需求、学校和社会层面的激励机制、对研究的鼓励及开展研究的机会、参与国际学术共同体、精通英语等等。这些做法会吸引最优秀的教师和学生, 进而形成一种学术文化, 让卓越和世界一流大学的梦想成真。

知识生产的多元化

在俄罗斯, 大学至少在近期不能专攻单一的研究模式, 这一点也非常重要。俄罗斯科学院进行研究生的培养, 能够做出被国际认可的科研成果 (至少在某些研究领域)。相比之下, 大学的研发活动则较少。由于高等教育和研究的组织特性, 因此建立并扩展大学和研究机构、大学之间的横向网络是非常重要的。此外, 大学的多样化 (即如今的官方举措) 不应该削弱大部分其他高校。很多高校不仅在各自所在的地区发挥重要的社会功能, 而且也为顶尖大学提供优秀的生源,

具有创新的潜力。人口的下降导致了学生数和学费的减少,这可能会激发大学通过创新和研究来寻找新的经费来源。知识的生产似乎正向多样化发展,因此,大学和科学院的一些区别可能会有所淡化。

结束语

国立研究型大学项目主要挑选科技大学(前苏联的理工学院),明显表明政府倾向于促进应用研发领域的创新,而低估了各学科

领域的基础研究在建设新的知识经济和民主社会中的战略优先性。同样,这样的经费资助规模几乎不能带来巨大的变化。

然而,作为建立新的自治组织的一个尝试,该项目为大学进行研发提供了新的机会,可能会极大地促进俄罗斯高等教育的发展。获得资助的大学近期不可能成为世界顶尖大学,但如果俄罗斯高等教育的常规建设进行创新,那么这些大学就会成功。

俄罗斯大学的“适中”合作战略

Igor Chirikov

国立研究型大学——高等经济学院(Na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y -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

经济社会学实验室研究员

电子邮箱: is@gorod.org.ru

在现代大学转变过程中,一个让人感兴趣的趋势是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尤其是国际层面的合作战略。在俄罗斯,大学普遍采用两种极端的战略:第一种是建立正式联系和委员会,但实际上未开展任何合作计划或项目;第二种是,政府不顾大学的反对,大规模合并地方大学。但是,一些大学选择了一种“适中(midrange)”的合作发展方式,即在地方政府和高科技企业参与的情况下,几个教育和科学机构组成一个联盟。

大学合并

在俄罗斯,高校的联系与合并受到了国家政策制定时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社会经济的巨变,迫使俄罗斯的大学在政府经费不足、与工业界联系减弱的情况下进行运作。与此同时,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和商业化成为大学发展的主要动力。从1991年起,每一万人中的高等教育学生数增加了2.5倍,2008年为475人。为了满足各种潜在人群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大学开始扩招。几乎所有有实力的大学都进行了区域性扩招,并建立了分校(主要提供收费专业)。

随着市场的日趋饱和,也就不需要有效的合作。各大学都将关注点聚焦在学校尽可能获得更多的资源和学生上。前苏联时期产生的互动和结构形式对大学来说不再有用。

以工业为基础的教育活动仅局限于偶尔的专家交流,以及教授同时受聘于几所大学的普遍做法。因此,很多大学委员会和协会变成了只是表面提供合作,但没有任何实际项目或成果的机构。

大学的合并基本上都不是由大学自发进行的。俄罗斯最重要的两次大学合并产生了西伯利亚联邦大学和南方联邦大学(都成立于2006年),促进了俄罗斯某些地区的发展。在这两次合并中,都是4所大学并为一所大学;在合并过程中,合并后的大学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和障碍。合并后的新大学组织结构僵硬,具有高度集权化的特点。此外,合并增加了大学的异质性,促使一些与新大学总体目标无关的团体产生。严重的立法漏洞破坏了大型计划的建立。因此,联邦大学如今的运作未达到预期的效果。

联盟模式

大学组成联盟是替代软弱的契约式合作和僵化的院校合并的一种模式。如今托木斯克市(Tomsk)的4所著名大学正在采用这一模式。参与的大学包括一所传统的综合性大学、一所医科大学和两所理工大学,地方政府、科学院的研究中心和高科技企业也都积极参与到该项活动之中。

经过密集的准备活动,各大学和其他参与方已经找出一系列需要解决的共同问题:

课程的重复设置、地区中不公平的教育竞争、年轻教学人员的比例低、吸引最优秀高中毕业生和学士学位接受者的竞争力下降等教育方面的问题；以及大型研究项目数量少、营销无效等研究和创新方面的问题。找到这些共同的问题，为参与的大学建立一系列进一步合作的共同目标和原则提供了可能。大学联盟将关注跨学科研究的发展，通过整合教育和研究加快创新过程，在国内和全球市场集体定位，以及提高大学的经济效益。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将通过采用灵活的双层组织结构来加以实现。在第一层（核心），各大学将开展大型的研究合作项目，从事硕士和博士生培养的双学位项目。在第二层（边缘），各大学将进行自己的教育项目和研究计划。

在筹划实际工作之前，还有两个相关的准备工作：开发一套城市学分互认系统（City Credit Transfer System）和设立公共技术转移办公室（Common 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学分互认系统让学生选修本市其他大学的课程作为学士或硕士学位课程成为可能。各大学则是就提供给该市所有学生的课程数达成共识，然后学生可以选择其中一些

课程作为学位课程，听课并参加期末考试。进行第二项准备工作的根本原因则是新科技和创新市场中的竞争迫切需要这样的机构。该办公室旨在克服托木斯克市地理位置偏僻的问题，协调投资者、高科技公司和研究者之间的关系。

合作的新动力

新的合作战略的出现，反映出有一些因素在激励大学不仅将彼此视为对手，也视为合作者。这些因素包括：首先，招生人数下降和粗放式发展带来的风险和问题，将迫使大学（尤其是地方大学）努力集体定位，共同吸引优秀的高中毕业生。其次，由于支持高等教育发展的国家政策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俄罗斯的大学需要开发有效的战略以争取或保持地位和额外的资助。合作是这些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三，俄罗斯的大学开始认识到加入全球知识经济网络、与世界其他大学建立联系的重要性。俄罗斯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否成功，在许多方面都取决于其国际竞争的成功与否。

埃塞俄比亚：扩张的困境

Liz Reisberg 和 Laura E. Rumbley

Liz Reisberg: 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研究人员; 电子邮箱: reisberg@bc.edu

Laura E. Rumbley: 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研究人员; 电子邮箱: rumbley@bc.edu

埃塞俄比亚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该国 3/4 以上的主要经济活动都与小规模农业有关, 不仅非常低效, 而且极易受到气候和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为了从农业经济转变为现代经济, 埃塞俄比亚要求人民接受更多的教育。对于地球上第 15 大人口国、年龄中位数仅为 17 岁的国家来说, 这一要求尤为关键。因此, 政府以极快的速度扩张着高等教育系统和学生规模。

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期, 埃塞俄比亚只有两所大学。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 私立高校的数量增加, 公立高校也同时有所增加。目前, 19 所新增加的公立大学要么是新建高校, 要么是学院合并后升级为大学的高校。此外, 还有 26 所地方师范学院, 近 60 所通过认证的私立高校 (仅有 1 所被认可为大学)。

高等教育的增长速度令人振奋, 但埃塞俄比亚目前的条件所带来的挑战让其高等教育系统的扩张更加令人畏惧。这个国家的情况体现了约翰·丹尼尔 (Sir John Daniels) 在他的“铁三角 (Iron Triangle)”论中所展现的紧张关系, 即入学、费用和质量三者之间不稳固的平衡关系。

入学人数 (男生) 的显著增长

埃塞俄比亚各级教育的入学人数都已显著增加, 有更多的学生在完成中等教育后继续接受高等教育。其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显示,

2000/01 学年, 公立大学的本科在校生 (不包括远程教育和夜大学的学生) 约为 34,000 人。2007/08 学年, 常规本科在校生超过 125,000 人。然而, 从扩招中受益的男生多于女生: 只有不到 30% 的本科在校生和 10% 的硕士生是女生。

质量上的挑战

虽然高等教育的质量难以衡量, 但仍然需要关注。在埃塞俄比亚, 教师数量的增长未跟上在校生数量的增长。2000 年, 该国的高学约有 3,400 多名教师。2008/09 学年, 高校教师数约为 7,500 名。换句话说, 虽然在校生的数量几乎翻了两番, 但教师数量只翻了一番。在师生比的变化上, 这一悬殊也非常明显, 从 1995 年的 1:8 变为如今的 1:15。

埃塞俄比亚的高等教育正在奋力填补师资方面的空缺, 但由于国内没有足够的合格人员来胜任这些教师岗位, 因此也从海外雇佣高校教师。多数高校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有效管理和指导这么多的无经验新教师。目前, 拥有硕士学位的高校教师不足 20%, 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不足 4%, 教师们的学术经验有限。

高等教育的质量也受到了基础设施的限制。在过去两年里, 埃塞俄比亚国内不停遭遇断电困扰, 只有极少数的高校拥有发电机, 以便维持技术设备在停电期间继续运作。教学楼的建造、图书收藏的扩大、电脑室的增

加以及互联网络的发展远远落后于扩招的速度。虽然国际组织正在帮助该国政府增加新的设备和设施,但这些努力既非常不协调,也需要时间。

费用问题

不断增多的大学生所需要的教育费用很快超出了政府资助的数量。为此国家出台了一项新的政策,让政府不再完全资助高等教育,而是实行成本回收方案。但是高等教育系统不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回报政府的资助。目前政府依靠国际帮助和外籍教师来填补高等教育快速增长所带来的很多缺口。但是,即便有这些资助,也无法满足这个发展中的高等教育系统的庞大需求。

人才流动

在埃塞俄比亚,太多最优秀的学术和管理人员在流动。现在,通过国家和捐助机构的项目,人们有机会出国攻读研究生或进行职业发展。从长远意义上来说,这势必将加强埃塞俄比亚的高等教育。然而,国外的教育机会通常会导致“人才流失”,甚至连大学教授和管理者的短期出国都会给国内高校带来重大的挑战。额外的教学任务落到了留下的教师身上,很多发展和研究项目常常被转给缺乏经验、能力不足的教职工。

与此同时,个人从一所大学跳槽到另一所大学,或离开高等教育系统的情况在埃塞俄比亚十分普遍。由于希望提高收入和进入城市地区,教职工流动在各个层面上都存在。

不断的教职工流动破坏了高校有效运营和长期规划发展的能力。

长期规划和短期行动

对于埃塞俄比亚的高等教育,除了这种没有相应设施、教职工或资源的快速扩张,还有没有其他可能呢?1999年,埃塞俄比亚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足1%。如果埃塞俄比亚政府那时决定在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循序渐进地发展的话,那么就可能不会在高等教育扩招方面取得如此大的进展。但实际情况是政府给大学领导和教师施加压力,推动国家的高等教育在为年轻人提供深造机会的同时,尽可能地迎头赶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埃塞俄比亚目前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3%。虽然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但埃塞俄比亚已经取得了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300%的快速增长,政府也将继续促进更大的收获。但问题是高校是否会为学生规模的增长准备相应的资源和人力。

对埃塞俄比亚的高等教育来说,现在是令人振奋的时期。但是如此快速扩张所带来的“成长中的痛苦”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将会继续下去。在这个关键时期,质量保证、提供适当和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必须被提到国家议事日程的首要地位。

南非提高学生保持率和成功率的措施

George Subotzky

南非大学信息与战略分析教授

电子邮箱: Subotg@unisa.ac.za

从全世界来看,高校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就是让学生数量的不断增加和学生群体的更加多样化与保持率和成功率提高协调发展。这种需要在南非最为迫切,原因如下:首先,南非大部分学生对高等教育的准备严重不足,这主要是由于南非种族隔离的后遗症和大部分初中等教育水平低下造成的。经过15年的民主统治,后种族隔离政府没有能够明显纠正这些不平等和效率低下。其次,多数学生来自落后地区,面临社会经济和财务条件的挑战,这两个因素对学生继续学业和成功毕业构成了威胁。第三,虽然在过去20年间,接受高等教育的南非黑人学生数量飞速增长,但是黑人教职员工并没有相应增长,校园文化也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因此,很多黑人学生认为自己在以前只为白人开设、盛行欧洲中心主义文化和做法的高校中被孤立。这也是黑人学生保持率、成功率和毕业率非常低的部分原因所在。自由州大学(University of the Free State)的一些白人极端分子在近期自制的录像里,蓄意羞辱黑人清洁员工,想以此来破坏种族融合进程的行为,突显了南非高校中种族主义的残留。录像引起了全国的公愤,教育部也因此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这个问题明显的和细微的表现,并提出建议。这个事件让人们开始关注南非高校转型不完全给黑人学生带来的阻碍。第四,南非一直缺乏高水平的技术人才,并因此阻碍了国家的进步和发展。特别是再

加上艾滋病对学生的保持和工作场所的巨大影响,以及南非患病率全球排名靠前的恶名,都使得提高入学率、保持率和毕业率成为重中之重。

问题的定量分析

南非高等教育委员会(Council on Higher Education)最近的一项全国调查反映出南非在保持率和成功率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一个严酷的事实是,在南非2000年首次入学的学生中,只有30%的学生在五年内毕业,调查时尚有14%的学生注册在校。这意味着超过一半(56%)的学生退学。在保持率和成功率方面,不同类型高校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在面对面教学的高校(contact institutions)和远程教育机构之间、学术型大学和职业技术学院之间,以及传统的优势大学和弱势大学之间。就五年毕业率来看,面对面教学的大学为50%,面对面教学的职业技术学院为32%,南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Africa,全国最大的大学)远程教育是14%,南非理工学院(Technikon South Africa)远程教育是2%。在退学率方面,各类高校也差别很大。南非理工学院的退学率是85%,南非大学是59%,面对面教学的职业技术学院是58%,面对面教学的大学是38%。由于绝对规模的不同,南非大学和南非理工学院的低毕业率和保持率对整体数据有巨大负面影响。

南非大学的个案分析

鉴于上述情况,南非政府向高校施加强大压力以提高保持率和成功率、而高校继续背负发展大规模学术项目的负担以改善糟糕的中学教育的结果,也就不足为奇了。对新的南非大学来说,提高保持率和成功率的压力最为突出。作为政府重建高等教育蓝图的一部分,原南非大学与南非理工学院以及另一所小型远程教育机构合并,旨在让新成立的南非大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巨型大学之一。新的南非大学有大约 260,000 名学生,目前在校生总数约占南非高等教育在校生总数的 1/3。该校为自由入学的学生提供学术和职业教育混合的教育项目,满足大批没有学位的临时学生的学习需求,因此在国内和非洲大陆的人力资源发展、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和提供养成教育机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规模庞大,南非大学获得了较多的政府资助。由于政府资助对产出非常重要,南非大学也出于经费方面的压力来有效解决提高保持率和成功率的问题。

南非大学面临的问题尤其可怕。学校大部分的在校生是非传统的非全日制学生,平均年龄为 31 岁。此外,过去几年间的快速扩招严重损害了南非大学的运作系统。这有时会对教学造成影响,例如学习资料分发迟缓而导致的学时减少。对 3 个大型贸易和法律本科教育项目的案例研究显示,学生的十年毕业率很低,在 14%~30%之间。但有趣的是,那些毕业生完成学业的时间在预期的最短时间(根据平均课程负担是相同专业全日制学生一半的课程量计算)之内。这些发现说明完成学业所花费的时间长度是令人满意的,因此,降低目前过高的退学率(50%~70%)是提高成功率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新的策略

鉴于上述原因,南非大学把提高保持率和成功率放在战略首位,并做了相应的努力,其中包括制定了应对这一挑战的框架及实施策略。学校首先是设计了一个概念模型来确定影响本校学生保持率和成功率的所有因素。为此,相关人员进行了全面的文献资料回顾,研究了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大量的学生保持率模型,并重点关注一些理论视角,包括社会学、人类学、社会批判学和心理学视角。从这些视角出发,新设计的模型涵盖若干核心概念,解释了南非大学学生保持率和成功率的影响因素,需要学生和学校的特征、期望与表现在学生入学后的各阶段充分契合。这一充分的契合来自对有意义的转变具有共同的认识和相互的责任感。对学生来说,这种转变意味着在努力控制多种(常常互相矛盾的)影响保持率和成功率的非学术生活环境的同时,发展出满足高等学习要求和期望所必需的个人特征、技能和知识。对高校来说,转变意味着配置并提高所有的学术、非学术和管理服务,从而满足学生个体的差异性需求。因此,对学生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了解得越多,高校能够开发并提供的有效学术服务、非学术服务和支持就越具创新性。学生对高等教育的严格要求和可用的支持服务了解得越多,其继续学业和成功毕业的机会就越大。

南非大学正在通过学生跟踪系统收集必要的定量和定性数据。在这个过程中,学校创造性地利用了信息通信技术和数据采集工具来获得学生相关的生活和学习经历,比如强制性的学生信息和在线调查、结构化的期刊文章、博客以及社会网络工具等。大约有 190,000 名南非大学的学生使用学生网络入口,为收集特别丰富的定量和定性数据、挖

据数据、建立统计和分析模型从而确定和预测影响成功率的因素提供了大量机会。根据预测出的结果，学校正通过再次创造性地使用信息通信技术来制定和实施主动的支持性干预措施，从而降低退学和不毕业的风险。通过这些方法，南非大学正在采取谨慎的措施配置学校的学术和非学术服务，从而为有效解决异质学生群体复杂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问题提供支持。虽然尚不能对这些行动做出评价，但预计这些行动将有利于提高南非整体的保持率、成功率和毕业率，不仅是因为南非大学在这些方面的表现，也因为南非大学的做法会为其他高校提供可仿效并适宜的实践经验。

新书简介

Andrade, Maureen S., and Norman W. Evans, ed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trengthening a Critical Resource.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9. 301 pp. \$44.50 (hb). ISBN 978-1-60709-175-2. Web site: www.rowmaneducation.com.

该书主要面向美国读者，是本非常实用的留学生指南。内容包括若干案例及相关问题分析，如留学生招生、入学指导、英语授课的课程、对留学生的社会支持、跨文化适应，以及移民与法律问题等。

Bassett, Roberta Malee, and Alma Maldonado-Maldonado, ed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Thinking Globally, Acting Locally?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312 pp. \$160 (hb). ISBN 978-0-415-99043-1. Web site: www.routledge.com.

该书主编认为，在全世界范围内，国际和区域性高等教育组织的作用都越来越重要。这些组织帮助各国和地区制定国际和国家政策、资助科研、组织讨论、沟通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书中分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合组织、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等若干重要国际性组织的作用，以及亚洲（包括一个中国的案例）、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相关情况。书中最后还分析了对发展中国家高校的国际援助。

Bowen, William G., Matthew M. Chignos, and Michael S. McPherson. Crossing the

Finish Line: Completing College at America's Public Universit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389 pp. (hb). \$27.95. ISBN 978-0-691-13748-3. Web site: www.press.princeton.edu.

该书根据对21所旗舰型公立大学和4个州公立高等教育系统的仔细研究，探讨了本科生的保持率和毕业率问题。作者研究了家长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高中成绩等关键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来自少数族裔和贫困家庭学生的毕业率较低，并且需要更长的时间毕业。虽然范围依然有限，但该研究是有史以来对保持率和毕业率最大范围的一次调查，所探讨是一个重要性在美国和全世界都日益增加的主题。

King, Roger. Governing Universities Globally: Organizations, Regulation, and Rankings.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2009. 235 pp. \$115 (hb). Web site: www.e-elgar.com. ISBN 978-1-84720-739-5.

该书的基本论点是，全世界的大学越来越受制于作者所谓的全球性治理（global governance），即来自于全球化的经济体系、经合组织和欧盟等区域性组织等的压力。书中讨论的问题包括跨国治理（如经合组织）、排名的影响、学术机构和高等教育系统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等。作者在这种新的全球性框架中，发现了一种学术趋同的趋势。

Meek, V. Lynn, Ulrich Teichler, and Mary-Louise Kearney, eds.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Changing Dynamics. Kassel, Germany: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2009. 240 pp. (pb). ISBN 978-3-934377-10-3. The electronic version is available from http://www.uni-kassel.de/incher/v_pub/UNESCO_RR_09.pdf.

该书审视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研究与知识论坛”(UNESCO Forum on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Knowledge)的工作,讨论的问题包括正在变化的学术工作、国家科研体系、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的动态以及如何衡量发展中国家的研发情况等。书中还探讨了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

Norwood, Stephen H.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Ivory Tower: Complicity and Conflict on American Campus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337 pp. \$29 (hb). ISBN 978-0-521-76243-4. Web site: www.cambridge.org.

该书研究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高校对纳粹在德国篡夺政权的反应,考察了当时美国高校与德国高校的关系。作者指出,纳粹思想当时主宰了德国的高等教育,德国学术界在努力传达新纳粹国家的正面形象。总体

来讲,美国高校并没有抗议或抵制德国的高校,依旧照常来往。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Education at a Glance 2009: OECD Indicators. Paris: OECD, 2009. 469 pp. \$87 (pb). ISBN 978-92-64-02475-5. Web site: www.oecd.org/publishing.

经合组织编纂的教育统计年报是对其成员和少部分其他国家进行对比时非常有用的信息来源。高等教育方面的信息包括成年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情况、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和完成率、高等教育的公共和私人经费投入、学费水平和公共资助种类、海外学习统计、高校教职工情况、毕业率等数据。

Sadlak, Jan, and Nian Cai Liu, eds. The World-Class University as Part of a New Higher Education Paradigm: From Institutional Qualities to Systemic Excellence. Bucharest, Romania: UNESCO-CEPES. 2009. 354 pp. (hb). ISBN 92-9069-194-8.

该书对建设和维持研究型大学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既包括案例研究,也包括专题分析。书中讨论的问题包括教师队伍、美国研究型大学模式的经验、评价问题、排名等,以及韩国、澳大利亚、中国、西班牙和瑞士等国的案例。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简介

为了加快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程，上海交通大学于 2007 年 12 月 26 日在原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学校直属的"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简称高教院)。高教院下设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科学与技术政策研究中心以及《国际高等教育》编辑部。

高教院坚持以实证和定量研究为特色，以"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为标志，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已经具有良好的国际声誉；以教育部科技委《专家建议》为标志，在政府咨询方面已经产生广泛的国内影响。

以小规模、创新型、国际化的世界知名人才培养基地为目标，高教院致力于培养高等教育学、科学与技术管理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在校硕士生、博士生和在站博士后总人数的规划目标为 80 名，且大部分博士生有出国访学经历，留学生比例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以小规模、高水平、国际化的世界知名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为目标，高教院致力于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学术研究团队，有选择地追求卓越，在世界一流大学研究、研究生教育研究、定量科学与技术政策研究等领域打造国际学术品牌。



The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GSE),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was established in 2007. GSE aspires to the highest standards of scholarly and professional practice, emphasizes quantitative research an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and focuses on applied research, policy studies and consultation.

GSE builds on the tradition of excellence of the former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1985. The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ARWU)", which was first published in 2003 and updated annually, has gained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Consultation reports on strategies for building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and science policies, which are provided to Chinese governments on a regular basis, have attracted national attention.

GSE focuses on higher education and specifically on research universities in the context of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t has three research groups, namely the Center for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Graduate Education, and the Center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The centers will have world-class research teams, leading international partners, and a highly internationalized student body.

GSE will uphold the best academic values—a commitment to academic freedom and original inquiry, service to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n China and beyond, and provide the best possible education to graduate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science policy.

Vol. 3, No. 1, March, 2010

Guoji Gaodeng Jiaoyu

(Translated from Number 58, Winter 2010,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Boston College)

Branch Campuses and Trans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Why Branch Campuses May Be Unsustainable	1
International Branch Campuses: Trends and Directions	3
Gulf State Branch Campuses	5
Trans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Why It Happens and Who Benefits?	8

International Issues

Politics, UNESCO, and Higher Education	10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 Enrollments	13
Power and University Presidents	15

Private Perspectives

India: New Directions for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17
Colombia: Problems and Achievements	20

China: Trends and Developments

Undergraduate Teaching Evaluation in China	23
Academic Freedom and Public Intellectuals	25
Institutional Diversification	27

Russia: Efforts to Reform

In Search of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29
Divided We Fall: Collaboration Strategies	32

African Developments

Ethiopia: The Dilemmas of Expansion	34
South Africa: Enhancing Retention and Success	36

New Publications	36
-------------------------------	----